

社会主义 科学学概论

C·P·米库林斯基 P·里赫塔 主编
李兴权 于得胜 等译 柴亦飞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会主义科学学概论

C. P. 米库林斯基 主编
P. 里赫塔

李兴权 于得胜 刘泽芬 译
蔡汝魁 魏智 许存根

柴亦飞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树琦

责任校对：古为明

封面设计：卫水山

版式设计：李玲玲

社会主义科学学概论

shehui zhuyi kexue xue gailun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75印张 345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500册

ISBN 7·5004·0160·4/C·2 定价：4.5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探讨了科学与生产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相互关系，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发展的条件和社会功能、科学技术成就与社会主义优越性有机结合的途径和形式，研究了国际科学技术合作问题。本书对制定科学发展的政策和规划、对宏观管理科学的协调发展都很有参考价值。

本书撰写组成员

苏联科学院院士	Д. М. 格维什阿尼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С. Р. 米库林斯基 (撰写组负责人)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И. Т. 弗罗洛夫
哲学科学博士	В. Ж. 凯勒
历史学科学博士	Н. Ф. 库兹明
哲学科学博士	В. А. 列克托尔斯基
法学科学博士	Г. Б. 斯塔鲁申科
哲学科学博士	Р. Г. 亚诺夫斯基
心理学科学博士	М. Г. 亚罗舍夫斯基
技术科学副博士	Ю. С. 沃隆科夫
化学科学副博士	С. Н. 卡拉-穆尔扎
技术科学副博士	Н. И. 马克申
经济学科学副博士	В. И. 马斯连尼科夫
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院士	Р. 里赫塔 (撰写组负责人)
哲学科学博士	И. 泽廖内
哲学科学副博士	К. 别尔卡
经济学科学副博士	Я. 伊拉谢克
经济学科学副博士	К. 缪列尔
哲学科学副博士	М. 皮特涅尔
哲学科学副博士	亚乌列克
教育学科学副博士	Я. 亚诺乌舍克

中译本前言

《社会主义科学学概论》一书是苏捷两国科学家——科学学家、哲学家、科技史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共同工作的结晶。所研究问题的多方面性和综合性要求这种不同知识领域专家的结合。

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发表的书评来看，本书受到了读者们的欢迎和好评，这是不难理解的。

社会主义和科学是当代两支最活跃的力量，因此对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进行系统的研究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生活表明，实践中能在多大程度上调整好这个相互作用的机制，从根本上关系到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因而也就关系到社会所提出的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的实现程度和速度。这一问题在实践中的重要性，要求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对它进行全面的理论分析，从而完善科学发展和将其成果迅速应用于生产的过程，在加速社会经济发展中最全面地利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及其潜在能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从这点出发，作者们把系统而全面地分析科学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看作是自己的第一项任务。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们的理论遗产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为得出这一问题的结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社会主义是第一个导源于科学的社会制度；人们第一次自觉地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科学看作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基础；社会主义在劳动人民的心目中把对科学的作用和意义的理解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无论对社会的发展，还是对科学本身的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然而，为了使科学能够顺利地发展，还需要社会作出相应的努力。这种辩证从属关系在这里不仅存在，而且确定不移地在起作用。因此，作者们对自己提出的第二项任务是：揭示使科学顺利发展及其各种功能得到最充分实现所必须的条件，也即使它对社会的物质和精神发展产生作用的可能性，如同列宁所说的“完完全全地、真正地”变为现实所必须的社会条件、经济条件、组织条件和心理条件等等。

作者们的第三项任务是希望揭示社会主义和科学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主义在科学和文化发展中的优越性，展示社会主义为科学和科学在社会中的应用而所开辟的新的前景。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反对科学至上主义，反对以技术统治主义愚弄人民的态度来对待科学和社会，反对他们把人变成逆来顺受的、似乎受科学自外部任意摆布的角色。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其本身都不能解决社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唯有劳动人民积极的、创造性的社会活动，才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然而，社会主义没有科学寸步难行，科学和技术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潜力的实现所必需的。社会主义可以完全公开自己的本质特征和完全展示自己的本性，并且告诉人们，为什么要让大家来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只有在利用科学和技术最高成就、在迅速将这些成就应用于生产，并从而达到高度的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同

样，社会主义也能为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创造任何其他制度所不能创造的条件。然而，这与技术统治主义的说教毫无共同之处。社会主义第一次真正地把科学和技术用来为人服务，用来为提高人的物质福利和精神财富、为人的全面而和谐的发展服务。

第四，从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和社会关系问题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发展科学的条件和目的发生了变化，而且科学的社会功能也发生了变化。科学从作为人外部的、凌驾于人之上的力量，第一次变成了伟大的、自觉而有计划发展着的、为人的利益服务并为人所利用的社会改造力量。

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科学各种社会功能的变化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使各种科学社会功能的相互关系更加协调，使它们的内容更加充满人道主义。

希望提请读者们注意的第五个结论是，社会主义促进着以新的价值体系（人的普遍而全面的发展是它的最高价值）为目标的新型科学的产生。关于当代诞生新型科学的思想，已故拉多万·里赫塔曾酝酿了很久，在一些苏联哲学家的著作中也有过不同形式的阐述。在本书中，这一思想又得到了新的发展。

社会主义为这种新型科学提供了最适宜的社会基础。社会主义促进新型科学的诞生这一事实，不能不认为是社会主义对科学所具有的永不泯灭的国际意义。社会主义需要科学，科学为社会主义的巩固、壮大和发展所必需。而从另一方面来讲，任何一种制度也不能象社会主义那样为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创造那么多优越的条件。

在这个专门为中译本撰写的前言中，并不想列举

作者们在书中详尽展开并论证的所有要点，否则就会在这里复述许多书中的内容。再说，也没有这个必要，细心的读者自己会在书中找到的。但是，我们仍打算再说明两点，因为我们认为这两点对理解全书的内容和把握作者阐述主题的方法是十分重要的。第一点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

社会主义是不能靠宣布来实现的，更确切地说，如果有人有这种想法，那也无济于事。冒进、把愿望当作现实，对任何人都无益。社会主义应该在实践中、在生活中成熟，并脱颖而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社会主义同任何其他现象一样，要求用历史的态度予以正确的理解。为了能正确地评价社会主义，就需要在发展中去研究它，也即是说，不能把它看作是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而应当看成是不断发展、成长和完善的着的事物。社会主义是一个新的，还很年轻的制度。当然，它不可能立即实现它所有的潜力，何况在它存在的整个时期内，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得不对付旧制度的疯狂反抗，有时甚至是在经济和军事上对社会主义的直接扼杀，更不必说要克服在开辟前所未有的道路中必然要遇到的那些困难了。

诸如个人崇拜和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自我陶醉和言行不一等这些与社会主义本质格格不入的现象，对实现社会主义的潜在能力、对充分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都带来了不小的危害。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未能阻止社会主义的前进步伐（顺便说一句，这也成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生命力和威力的旁证），但毫无疑问，它们拖延、推迟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

作者们所依据的自然还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生动的

经验。但他们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不断成长、发展和完善的现象，看成是一个在发展中逐渐显示其本质特征的过程，而并不拘泥于影像式地反映某地的某件事情，更不把所见所闻当成典型、充作最高理想的化身。

作者们给自己提出的理论任务是，如何才能更全面、更具体地弄清，在社会主义这个当今历史阶段最先进、最人道的社会主义制度中蕴藏着哪些有利于科学和文化发展的条件。这一理论任务的实际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在这一领域中比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巨大优越性，就象“出水芙蓉”一样，变得有目共睹和令人向往。

好在许多优越性，有些还是根本的优越性，已在一定程度上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活中有所表现。这就减轻了我们的任务，更加坚定了我们进行理论分析的信心，尽管我们现在十分明白，远不是所有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和矛盾都能为我们所捕捉和阐明的，这在苏共中央（1985）四月全会、苏共二十七大和苏共中央（1987）一月全会以后就更加清楚了。在这些会议上，直截了当地揭露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所存在的缺点和消极现象，制定了以改革、全面完善苏联社会生活所有领域，在深化民主与加强纪律、健全制度、提高责任心和关心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相结合的基础上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在国民经济中加速采用以科技成果为内容的革命纲领。

我们认为应当注意的第二点是，作者们在书中揭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及其巨大潜力时，力求让读者们意识到，不论这些原则、优越性和潜力有多大，它们照例是不会自动起作用 and 自动实现的。它们的实现取决于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取决于社会是否善于为它们的实现制定具

体的机制、及时发现条件的变化并据此加以修正，或者更换那些造成混乱或已不能有效起作用的形式和方法（机制）。适时地指出，在哪里、哪些形式和方法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成果在生产中的应用业已失效，哪些已再不能满足需要，以及应该用哪些去代替——这首先是科学家本身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那些把科学（作为特殊的活动形式和社会建制）的功能选作自己研究对象的科学学家的责任和义务。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民主制度在社会和科学本身中确立得越牢固、越深入，官僚主义清除得越彻底，为科学所作的贡献、给社会所带来的利益越成为评价科学家和科学集体的唯一标准时，这项工作就进展得越迅速、越顺利。历史早就证明，科学成就与民主是携手并进的。学术见解的自由发表和争鸣、富有创造性的讨论、科学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容许任何个人和团体的专制和垄断——是发展科学所必须的条件。科学中的民主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即在解决科学问题时，不能以多数意见为结论。但是，谁也不能忽视社会的利益。然而，为了不致给自己造成严重损失，而对当今来说，即使为了免遭落伍的现实危险，社会也要在同样程度上重视科学的利益。忽视科学的利益，对社会来说即意味着忽视自己的切身利益。

作者们当然清楚地看到，科学和技术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发展，在一系列领域，特别是在生产中采用科技成果的速度上，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时还处于领先地位。其原因并不在于社会主义的实质，恰恰相反，而在于我们还没有学会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可能性和优越性，在于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机制还制定得不够完善。社会主义在其不长的历史中，不止一次地、令人信服地向全世界展示过自己巨

大的内在潜力。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还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在空前短暂的时期内，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实际上仅用了十年稍长一点的时间（从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末），就发展成当时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了。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跃进。在1941—1945年的战争中，苏联顶住了德国法西斯的猛烈攻击，为粉碎德军和从法西斯奴役下解放欧洲人民作出了主要贡献。法西斯的入侵，曾摧毁了战前我国工业最发达的西部地区，摧毁了数千座城市和村庄。但在屈指可数的几年当中，就得到了重建。苏联迅速地解决了原子能问题，从而打破了美国在这一领域中的垄断，首先开辟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道路，第一个利用可控装置，其中包括载人飞船在内来研究宇宙。社会主义把俄国从一个落后国家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强国。然而，近些年来的发展速度却降低了，业已成熟的问题解决得很慢，逐渐积压下来。苏联人对此很不满意。这就是在这里所要说的。自（1985）四月全会开始的改革，并不是社会主义软弱的见证，而正是因为人民以前所做的努力、积累的经验和在以往艰难条件下所取得的成果和成就，社会主义才面临一个新的跃进，面临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攒足了力量，以便清除官僚主义，清除蜕化堕落分子，清除一切阻碍前进的东西，使经营管理的形式和方法现代化，适应新的条件，在党和国家的所有环节中发展和深化民主，发挥全体人民的创造积极性和主动精神，全面利用科技进步来加速我国的经济的发展。

* * *

本书出版已经六年了。虽然这段时间并不长，但是构思范围却发生了显著变化。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以及而后的苏共二十七大和苏共中央一月全会所推行的进一步推动社会生

活所有领域全面改革的宏伟纲领，在苏联人民中间唤起了多么大的动力、活力和意志力去改善生活，去消除过去的错误和缺点，去更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原则和社会正义，争取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和苏联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去捍卫和平、防止热核战争的威胁，坚定不移地推动裁军进程。苏联进入了一个依靠自己创建的基础，从根本上完善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新的历史时期。

所有这一切都对科学和技术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阅读这本六年前所撰写的著作时，这些新要求也应当考虑在内。在那时，对苏联人民现在所进行的改革还不甚了了，最多也只把它看成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

最后，对这部书能同中国读者见面，感到十分欣慰。同时向将这部书翻译成中文的中国同志所作的积极努力，表示感谢。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教授

C. P. 米库林斯基

1987. 2. 17.

译者的话

——苏联科学学“韦尔纳茨基-米库林斯基”学派
与《社会主义科学学概论》一书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C. P. 米库林斯基和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院士 P. 里赫塔主编的《社会主义科学学概论》的中译本，已同我国广大读者见面了。

社会主义和科学是科学学一个重要而严肃的命题。有关这一命题的论述，也曾散见于一些刊物和著作中，但象本书作者们如此系统的阐述，尚未读到过。这部书既是苏、捷两国科学家合作的成果，也是苏联科学学“韦尔纳茨基-格森-凯德洛夫-米库林斯基”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译者的话”中概要地介绍一下科学学和“社会主义和科学”问题同苏联、苏联“韦尔纳茨基-格森-凯德洛夫-米库林斯基”学派的渊源。

科学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一门从总体上探讨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与社会其他建制相互关系的学问。这个研究领域是通过科学技术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经济学和科技创造心理学等的研究而形成的。因此，美国著名科学学家 D. 普赖斯曾给它下过一个相当宽泛的定义，称它是“科学、技术、医学等的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方法论等”。研究科学学的目的在于加深对科学自身及其发挥社会功能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制定

科学的组织、计划和管理最佳原则的认识。这项任务是原有任何一门科学都无力完成的，因此需要一个各门学科的新的综合体，这就是科学学。

科学学是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进步交互作用的产物。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和技术均得到迅速发展，并分别经历了多次革命，从而推动了科学与工业等部门的结合。这不仅为把科学当作一个特殊而独立的研究部门，而且也为日后综合研究科技与经济等社会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关于科学发展问题的某些侧面，许久以前就开始研究了。但把科学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方向来研究，则只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并且与社会主义苏联一批科技史工作者有着直接的关系，或者确切些说，科学学实际诞生在二、三十年代的苏联。关于这一点，J·贝尔纳学派主要成员 A·L·马凯教授于1985年7月在北京的学术报告中直言不讳。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不仅促进了科学社会功能的增长，而且也使综合研究和规划科技活动的需要变得更加迫切。如1920年，列宁就领导200多位科学和技术专家制定了宏伟的全俄电气化计划，首次从国家层次上来综合规划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把社会主义政权同技术经济规划有机地连接了起来。

苏维埃国家接收并改造了旧俄帝国科学院，使其成为国家的科研活动体系，并赋予它恢复国民经济和满足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等重大任务；还在最困难的1918—1921年期间，国家就兴办了50多所专业科学院、所。1923—1928年，苏联研究机构总数增加了两倍。成立由政府支持和协调的大型研究机构，这在当时突破研究工作主要在大学中进行的国际科学组织体制方面，实乃一大创举。与此同时，列宁和布尔什维

克党“要求立即广泛使用资本主义”留下来的“科学技术专家”，给予科技专业人员以特殊的物质待遇；恢复研究机构同国外研究中心的直接联系；大量出版书刊。1923年，苏联科学期刊、论文和图书拥有量比1921年增加了四至八倍。在新经济政策和工农业迅速恢复的基础上，整个二十年代成了苏联科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上述这一切不仅为科学学的问世提供了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良好的社会条件，而且这本身实际上也就是科学学问题。这是其一。

第二，苏联科学技术史学派开始形成。苏联的科学学研究，具体是从苏联科学技术史学派开始的。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对科学发展的某些方面，Г·格尔穆戈尔茨、К·贝尔纳、Т·格克斯里、К·А·季米里亚泽夫和В·И·韦尔纳茨基等，都作了大量的思考和工作。但那时的研究还都是分散进行的。1921年，В·И·韦尔纳茨基院士建议在科学院系统成立苏联第一个专门研究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的科学组织——科学、哲学与技术史研究委员会（次年更名为知识史委员会）。

同期，在苏联科学和技术史研究方面起重要作用的还有共产主义学院，特别是它在1924年成立的自然科学与精密科学研究室。对推动科学学直接问世作出卓越贡献的Б·М·格森，当时就在该室工作。

继В·И·韦尔纳茨基等研究科学创造和科学组织等问题之后，苏联学者Н·鲍里切夫斯基于1926年发表了题为“科学学是一门精密科学”的论文。

1927年底，自然科学与精密科学研究室向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建议成立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以便独立地从事自然科学史和我们今天称之为科学学问题的研究。

1932年2月，以知识史委员会为基础，成立了统一的苏联科学院科学与技术史研究所，B·И·韦尔纳茨基和B·M·格森等均是当时该所学术委员会的重要成员。

第三，二、三十年代，苏联相继公开出版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著作，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1925）、列宁的《哲学笔记》（1929—1930）、马克思的《数学手稿》（1935）等等。这对科学史和科学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与方法论意义，为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来研究作为整体的科学及其社会诸领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锐利的武器。其后，科学与技术史研究所又承担了新任务：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有计划地研究对苏联具有现实意义的，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国家的科学史和从来未被研究过的技术史。

苏联科学史家在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下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提交1931年伦敦第二届国际科学史会议的十余篇论文，引起巨大反响，并于同年被收入伦敦出版的《十字路口的科学，第二届国际科学与技术史会议文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日等国均有出版）。尤其是B·M·格森题为“牛顿力学的社会经济根源”的报告，在与会者中间引起轰动和热烈的争论。这是苏联第一次向国外同行介绍运用马克思主义原则分析科学发展问题。它强烈地吸引着科学史家在研究科学技术发展时注意诸如社会经济等因素的重大作用。格森的报告“犹如爆炸式作用”（日本著名科学史家汤浅光朝语），直接导致其后一系列研究科学发展社会因素著作的问世，如J·霍尔丹的《代达罗斯，或者科学和未来》（伦敦，1934）、L·霍格本的《为平民的科学》（伦敦，1938）、J·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伦敦，